

史苏苑

河南人民出版社

历史人物评价

海内

历史人物评价论稿

史 苏 苑

河南人民出版社

历史人物评价论稿

史苏苑

责任编辑：张红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57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20册

统一书号11105.102

定价1.30元

前 言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曾经写过两个评论中国历史人物的小册子，分别评论了十六个有影响的中国古代人物。弹指一挥间，二十多年过去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祖国重新开始了科学的春天。个人也在经历了十年折腾磨难之后，结合着教学，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对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又作了一些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乃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读书笔记。此外，在教学中，也遇到了一些实际的知识性的问题，如国号、庙号、谥号和年号等。这一部分虽然没有什么理论意义，但却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因而也略加述考，作为本书的附录。

本书中的大部分篇章，曾在大学历史系讲授过，有些还曾在《历史教学》、《社会科学战线》和《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过。此次汇集时，又作了较大的修改，前后历时五年。但是，由于这些问题的理论性和知识性都很强，而个人的水平又有限，因而缺点和错误仍在所难免，谨请读者同志们不吝赐教，及时予以指正。

史苏苑

1985年10月于郑州大学

内 容 提 要

本书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理论，在综合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最基本的或经常碰到的十四个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一定的创见。书后还附有《论国号》等五篇知识性文章。

目 录

一、小引——个人性格特点在历史上的作用·····	(1)
二、我国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阶段·····	(12)
三、评价历史人物的两个重要前提和一个基本 标准·····	(34)
四、运用阶级分析法评价历史人物的几个具体 问题·····	(42)
五、分时期(或阶段)评价历史人物论·····	(56)
六、主次(或功过)相较评价论·····	(84)
七、评价历史人物需要把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 适当分开·····	(104)
八、评价历史人物,既要重视生前成就,也要 顾及身后影响·····	(114)
九、关于民族英雄的斗争活动和思想感情的区 别认识问题·····	(119)
十、历史人物评价中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	(125)
十一、哲学观点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问题·····	(136)
十二、评价历史人物中客观和主观的统一问题·····	(142)
十三、对农民革命领袖一分为二的问题·····	(146)
十四、关于清官的几个问题·····	(159)

附 录:

- 一、论国号..... (85)
- 二、庙号、谥号、尊号述考..... (201)
- 三、商朝国号浅议..... (215)
- 四、论年号..... (222)
- 五、论历史人物名讳..... (233)

一、小引——个人性格特点

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的基本内容不外乎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等。研究历史也就是要评论人物、分析事件、考察典章制度等。而任何的事件、典章、制度等，又都必须是通过具体的人物来展开和制定，即总是需要由人们来进行干预。这也就是说，历史无非是人们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也正如恩格斯所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4页）因此，评论人物在历史研究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就没有忽视或低估过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一方面明确指出来，任何个人（包括所谓伟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的方向和基本规律；同时，另一方面也指出来，个人可以起到加速或延缓历史发展进程、局部改变历史外貌的作用。而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此种作用的程度则又和其性格特点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不妨认为，所谓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质言之，也就是个人性格特点所

给予历史事变的一定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于肯定经济条件是决定历史发展前提的同时，对于个别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也相当注意，并经常有所论述。早在1871年，马克思就说过：“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恩格斯也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尤其是对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这一问题作过专门深湛研究的普列汉诺夫，说得更为明白具体。他在1898年这样说：“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能决定各个历史事变的局部外貌……如果你认为各个事变的局部特点都是由一般法则的作用所制约而与历史人物的个别特性无关，那你就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这种特点是由一般原因来决定，并且丝毫不会因历史人物改变而有所改变，于是这个理论就变为宿命论。”（《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70—371页）

又说：“现在应该把生产力发展情形看作人类历史运动的终极和最一般的原因……除这种一般原因外，发生作用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即某个民族生产力发展进程所处的历史环境……末了，除特殊原因的影响而外，还有个别原因的作用，即社会活动家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性’的作用，因为这些个别原因的作用，于是事变就具有其个别的外貌……如果影响了历史的那些个别原因已被别种个别原因所替代，那末这个历史无疑是会具有别一种外貌的。”（同上，372页）

要真正弄清楚一个时代的历史全貌，就需要在认真分析这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人民群众作用的同时，也要恰当注意个别杰出人物的影响，研究个别人物的历史作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根据一定的历史资料来说明某个人物性格特点在当时的条件下怎样局部改变历史的外貌。至于这种影响，范围的大小，时间的长短，程度的深浅，则和个人的主观条件，包括气魄、胆量、毅力、眼光、爱好等等又不能分开。在评价历史人物中，适当地描述他们性格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马克思在谈到美国总统林肯时说：“（林肯）是史册上《Suigeneris》（“有其独特之处的”）人物。他从不首倡什么，从不表现激情，从不装出姿态，从不使用历史帷幔……一个善良的常人。”（《北美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86—587页）又说：“这（林肯）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

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决不象那些天生的统治者那样做一点点事就大吹大擂。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总统的公开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08—109页）恩格斯也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对“正义者同盟”的领袖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三个人的性格以至身体特点都作了非常细致的描述。他形容沙佩尔说：“他身材魁伟，果决刚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三十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他虽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题，并且一经理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他是个纯粹的人，他在建立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他形容亨利希·鲍威尔这个生于法兰克尼亚的皮鞋匠说：“他是个活泼、灵敏而诙谐的小伙子；但在他那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果断。”他描写科伦的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说：“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在毅力和决心方面无论如何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慧上则胜过他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7—188页）恩格斯又在谈到欧洲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的法国傅立叶时，说他“不仅是批评家，他

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1页）谈到英国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时说：“这个人具有象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同上413页）斯大林在《论列宁》一文中描写列宁的性格特点是：“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又说：“‘不因胜利而骄傲’，——这就是列宁性格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冷静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保证党不遭可能发生的意外。”又说：“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9—57页）高尔基也曾描写列宁的性格特点说：“列宁是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他十足禀有最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性格——自制力。……他生活俭朴，烟酒等嗜好都与他无缘。……他从早到晚忙于繁重的工作，完全不会照顾自己，对同志们的生活却关切得无微不至。”（《忆列宁》）毛泽东同志赞扬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621页）

谁都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毛泽东等人不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不是英雄史观论者，而是反对宣扬资产阶

级人性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试问假若历史人物的个人性格特点要是完全和革命事业、历史事变没有关系的话，那末，他们又有什么必要来如此不惮其烦地描写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呢？他们之所以这样不惜笔墨，一再描写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恰恰是说明了这些性格特点有着其一定的历史作用。比方说，如果林肯不是“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纵然是已经有了属于经济方面的根本原因，即美国南北方之间的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之间的矛盾，亦即奴隶制度和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矛盾，而林肯却仅仅是一般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话，他是否还会那样的鞠躬尽瘁，终至以身殉职呢？倘使这时要是换成一个另一种性格的总统的话，恐怕美国那时的黑奴解放事件是会出现另外一种进程、呈现另外一种外貌的吧？如果沙佩尔和鲍威尔的性格特点不是“果决刚毅”和“机警果断”，而相反的是“懦怯寡断”和“迟钝犹疑”的话，其对于当时的革命工作所带来的后果能会完全一样吗？如果列宁的性格不是“不因胜利而骄傲”的话，他是否还能够“冷静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保证党不遭可能发生的意外”呢？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恰恰是由于列宁具有“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一特点，所以他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如果列宁不是“意志非常坚强……禀有最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所特具的自制力”，他能够经得住多次严峻的政治的和生活的考验吗？由此可见，列宁个人的这种可贵的性格

特点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及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是多么的大呀！如果白求恩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的话，不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的话，他会不会“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呢？如果与此相反，他也是一个“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话，那他还会以半百以上的老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牺牲掉自己的生命吗？那他还有什么值得纪念和学习的呢？白求恩的这种高贵品德，正是使他成为具有高度国际主义精神的伟大无产阶级战士的重要主观因素。

联系到我国的历史人物，此种事例也是俯拾皆是。如果秦始皇没有那样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才能，象唐代大诗人李白所咏赞的那样：“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秦王扫六合》）没有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惊人的处事毅力，如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所记的那样：“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程）〔指定额〕，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朝能否会在短短十年之内就风卷残云般的统一了东方六国呢？如果秦始皇不是死得这样早，或者秦二世胡亥也和乃父一样英明强干，秦朝的农民起义是否也会爆发得这么快呢？如果诸葛亮不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只是一个庸碌人物，蜀汉还能否一定以益州一隅之地，和

魏、吴两国形成鼎立的局面呢？如果不是诸葛亮先死去了，蜀国会否在三个国家中最先亡掉呢？清代人赵青黎在《星阁史论·蜀汉后帝论》中说：“若蜀后帝可不谓中材之主哉？惜武侯先卒耳。武侯不卒，必不失国。”这话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又如隋朝既已有了那么好的巩固统一的历史条件和雄厚富庶的经济基础，要是隋炀帝杨广也和其父文帝杨坚一样，勤政节约，而不是无止境的浪费、惊人残暴的话，隋朝是否会延长一些，甚至延长较久呢？如果唐高宗李治不是性格懦弱，身体多病，武则天不是“素多智计”，她是否就能迅速夺得那么多的权力，从而一定会在李唐王朝中间，一度出现一个“武周”历史阶段呢？这一系列的问题不都是值得探讨的吗？假若肯定，反正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不管出现一个秦始皇式的人物与否，那也必然要在十年之间就出现一个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不管秦二世胡亥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当了二三年皇帝，秦帝国也必然大崩溃；即使不是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蜀国也会因宦官乱政而首先灭亡；不管唐高宗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当时也一定会产生一个“武周”政权，等等。这不是典型的历史宿命论又算什么呢？

至于说到这种个人的作用，即个人性格特点的影响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和范围？普列汉诺夫也有明确的解释，他说：

“个人因其性格带有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这种影响表现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结构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

定。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所以，如上面所已谈到的，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分析历史事变和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同时考虑到历史进程的一般原因（即生产力发展的情况）、特殊原因（即某个民族生产力进展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个别原因（即社会活动家个人的特点及其他“偶然性”的作用）三个方面，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三个原因是由一般到个别，步步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的。普列汉诺夫在论述到个人性格特点所给予历史事变的影响时，还再三举出法国皇帝路易十五的例子。他指出，在奥地利的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中，由于路易十五的性格太软弱，以致使法国在《亚琛条约》中一无所得，从而影响到法国领土的扩大，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进程。又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也是因为路易十五的性格不“严峻”和“好色成性”，受制于宠妃彭帕杜尔夫人，纵容她袒护庸碌的将官苏俾兹，以致使法军遭到“极可耻的失败”，丧失了最好的殖民地领土，对法国经济关系发展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

如果完全不顾个人的性格特点及其他“偶然性”，那就会有很多历史事件无法作出全面的分析，很多历史人物就难以作出正确的评价。至于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为什么又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别，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既有属于自然方面的生理的原因（如血型、遗传等），又有属于社会方面的原因，这涉及到家庭、学校、老师、朋友、知识状况、

所受锻炼等等。这里很具体、很细致，不能简单化、公式化，不能一般的泛泛而论，需要作具体的分析。这种具体的分析也正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部分内容。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每当历史上一个新的历史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并肩或接踵而来，这样那样地提出类似相近以至相反的方案，采取类似或相反的行动以试图解决这种历史任务。这种方案或行动，要末来自统治阶级的某些官僚，他们想在不触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行改良主义的所谓“变法”；要末来自被统治阶级的某些人物，他们要以革命的方式，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原来的统治政权。而所有这种“变法”或“起义”，又都会有成、败、好、坏的各种不同结果。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同的情况，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而在这种主观的原因中，也就显示出了个人性格特点在历史上的作用。

总之，包括着思想、观点、品质、胆量、年龄、嗜好、才能、威望等等在内的所有个人特点(部分属个人性格特点)，在评价历史人物中都需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考虑。我国俗语有谓：“事在人为”、“因人而异”等等，这些都从某种意义和程度上说明了个人特点对于历史进程和外貌所产生的影响。完全一样的历史时代，基本相同的客观条件，一些人做着一样的事情，而所得的结果却有成有败，有好有差，其原因究竟何在呢？这就不能不认真考虑一番参与其事者的主观条件，部分为个人性格特点所起的一定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